·海外中国学·

DOI:10.20004/j.cnki.ujn.2025.02.009

“中国想象”走出去

——中国科幻文学在西方世界的译介与传播

吴　攸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摘　要]“想象力”已成为最具前瞻性的文化软实力因素,对未来想象的定义权是当今世界大国力量博弈的新焦点。中国科幻诞生于晚清时期对西方科幻的大规模译介与模仿浪潮之中,发展至当下又以“跨媒介”“社交化”的方式在西方广泛流传、影响倍增,“中国想象”在西方的传播呈上行态势,这一历程反映出中西交流模式的演进。数字全球化时代,媒介融合与参与式文化的兴起催生了全新的文化范式:传统媒介与新型媒介交汇融合,草根媒体和机构媒体相互渗透,媒介生产者与消费者(受众)不断互动,传统的“翻译—传播—接受”路径已经转型为多声部、进行态、去中心化的“全球参与”传播模式。纵观“中国想象”走出去的历程,经历了从“抵达精英”到“征服大众”,从“内容”传播到“模式”输出的跨越,逐步走进西方文化的深层空间。这表明,充分运用新媒体社交功能推动海外粉丝自发参与中国文化传播,以中国科幻IP推动海外原创生态形成,能够赋予“中国想象”多重延伸空间与世界性活力。

[关键词]中国想象;中国科幻;译介;传播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25)02-0087-11

继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与社会制度之后,“想象力”已成为当下国家文化软实力最前沿的组成部分,不仅影响着一个民族自身的发展潜力,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对外感召力与吸引力①。想象力是科幻文学的核心要素,而科幻文学则是想象力的重要载体,科幻这一文类自19世纪诞生于西方之时起便承载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测”和“憧憬”。中国科幻文学直接受哺于西方,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诞生期(1891—1949)、开拓期(1950—1966)、复苏期(1976—1999)与发展期(2000—至今)四个阶段,它在西方传播的努力则“孕育于诞生期,萌芽于开拓期,系统性发端于复苏期,而蓬勃于发展期”②。纵观百年科幻发展史,从晚清时期通过对西方科幻的大规模译介与模仿而诞生,发展至当下以跨媒介传播的方式在西方广泛流传、影响倍增,中国科幻文学及其背后的“中国想象”在西方的传播呈上行态势。这一“中学西传”历程不仅推动了中西人文对话,也为人类共同面对的未来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是中国文化成功“走出去”的典型案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科幻文学在西方的跨媒介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3BWW016)。

[作者简介]吴攸,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博士,邮箱:youwu80@163.com。

①本文中论及的中国科幻可从两方面理解:第一,具象层面,即中国科幻文化产品(科幻小说、电影、漫画、动漫、游戏以及各类衍生品);第二,抽象层面,即中国科幻所蕴含的价值信念。无疑,具象层面的科幻文化产品是“中国想象”的载体,而“中国想象”走出去的重要性则在价值观层面体现得更为深刻。

②吴攸:《“中国想象”在西方科幻世界的传播》,《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2月19日第A5版。

一、西学东渐:“科学小说”诞生与“中国想象”孕育(1891—1949)

科幻这一文类诞生于西方工业文明的蓬勃发展之中,在深受殖民威胁、民族危机深重的晚清时期以“科学小说”之名被译介至中国,成为彼时进步知识分子宣传科学观念、开启民智的重要手段。1891至1892年,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翻译了美国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乌托邦小说*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1888),以《回头看记略》的中文译名刊载在《万国公报》,引译西方“科学小说”的浪潮由此开启①。尽管将科幻这一文类引入中国的是西方传教士,但此后轰轰烈烈投入翻译浪潮的则多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从晚清到五四,梁启超、包天笑、鲁迅、吴趼人、徐念慈、杨心一、茅盾、周作人等诸多知识分子均翻译过西方“科学小说”,他们希望借此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树立理想社会的范本,服务于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需求。

近代中国将学习西方视为“挽民族于危亡、扶大厦之将倾”的重要手段,而借鉴西方文学传统则是其中的重要方面。1894—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昭示着洋务运动的失败,也促使进步知识分子将学习西方的重心由器物层面转向制度与价值观层面,愈加注重思想启蒙。他们认为与正统的科教宣讲相比,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作品能够以一种更加轻松愉悦、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民众价值观念。比如,康有为强调“泰西尤隆小说学哉”这一点值得中国借鉴,提出“今中国识字人寡……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之”②。这里的小说指的是“新”小说,与中国文学传统的“旧”小说相对;前者具备“改良群治”的社会功用,而后者则被斥为“不出诲盗诲淫两端”③。在这一背景之下,梁启超先后撰写了《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两篇文章,将中国民众精神上的愚昧和落后归咎于中国传统小说,发起小说界革命,掀起翻译西方“新小说”的风潮。在晚清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近代中国“科学小说”的诞生与“中国想象”的孕育有以下特点。

第一,现代印刷媒介的发展客观上为“中国想象”的孕育创造了条件。“小说界革命”固然是中国科幻诞生的重要文化背景,然而晚清报业的发展则为其传播提供了扎实的平台,中国科幻的诞生离不开印刷媒体(彼时的新媒介)的迅猛发展。一时间,进步人士争相创办新式报刊和出版机构,使其成为刊载、宣扬“新小说”的重要阵地,也为孕育中国本土科幻文学创造了条件。一方面,新型报刊蓬勃发展。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率先创办《新小说》(次年编辑部迁至上海),创刊号刊载了他本人翻译的法国反乌托邦小说《世界末日记》(标为“哲理小说”)④和他原创的未来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标为“政治小说”),同时还开始连载南海卢籍东翻译的“科学小说”《海底旅行》(1902—1905

①尽管这部小说并不属于严格的科幻小说,然而在探讨科幻这一文类的历史之时,往往追溯到更早的乌托邦小说。比如,达科·苏恩文(Darko Suvin)的《科幻小说变形记:科幻小说的诗学和文学类型史》将科幻文学与乌托邦文学、讽刺文学的悠久传统联系在一起,展现了科幻与乌托邦想象的相互交织。苏恩文称莫尔的《乌托邦》囊括了那个时代的所有科幻小说的形式,因此其与威尔斯在近代科幻史上的作用相同。参见:Darko Suvin.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05;《剑桥科幻小说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cience Fiction*)中所列的年表也将科幻历史追溯到1516年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1627年 培根的《新亚特兰蒂斯》。(参见:Edward James and Farah Mendlesoh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cience Fi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xx.

②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节录)》(1897),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史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③任公:《清议报》,1898年第1期。

④晚清翻译或原创的科幻小说,除了直接冠以“科学小说”的之外,还有部分被归在“哲理小说”“理想小说”的栏目之下,上述子文类均属于广义的科幻文学。

年间连载）。1903年，李伯元创办了图文并茂的《绣像小说》，中国第一部原创科幻《月球殖民地小说》（1904）随后在此发表。此后，创办于1906年的《月月小说》刊载周桂笙翻译的《飞访木星》（1907），还刊登大量中国原创科幻作品，如：萧然郁生的《乌托邦游记》（1906）、春帆的《未来世界》（1907）、包天笑的《世界末日记》（1908）和《空中战争未来记》（1908）、吴趼人的《光绪万年》（1908）。另一方面，现代意义上的出版业开始兴起。189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创办，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端，也成为最早出版“科学小说”的机构之一，代表作品有：商务印书馆翻译部译《环游月球》（1904）、金石、褚嘉译《秘密电光艇》（1906）、《异形奇术》（1908）。1904年，曾朴、徐念慈、丁芝孙、朱远生等人合作创办了小说林社，大量出版翻译小说，其中包括多部“科学小说”，如：徐念慈译《黑行星》（1905）、奚若译《秘密海岛》（1905）、包天笑译《法螺先生谭》（1905）、谢炘译《飞行记》（1907）以及徐念慈原创之《新法螺先生谭》（1905）等。

第二，“中国想象”的孕育离不开对西方科幻的引译，而彼时的译介活动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在“科学救国”的口号之下，翻译科幻小说的目的是改良群治、科学启蒙。近代中国“科学小说”的诞生离不开对西方文学的大规模译介和模仿，科幻这一文类被移植到中国文化语境之后，其发展轨迹由起初的“译介开路、学习西方”（翻译西方科幻），逐渐发展至“以西方之文类，议中国之问题”（中国科幻原创），一步一步推动了中国本土科幻创作的发展。学习西方离不开翻译这一跨语际、跨文化交流的中介，无论是在近代改良、改革亦或革命的变革努力之中，翻译活动均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早在甲午战败之后，维新派人士马建忠曾撰写《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大声疾呼，“译书一事非当今之急务与?语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战胜于疆场，则然，战胜于庙堂，亦何独不然?”[①] 换言之，他提出翻译的重要性在于庙堂、社稷，可助力中国决胜于另一无形的疆场。1896年8月开始，梁启超在《时务报》（两篇在《清议报》）发表一系列政论文《变法通议》，其中发表于1897年4月的《论学校七》便是专论“译书”一事，他视翻译可“以为救焚拯溺之用”，将译书视为关系民族存亡荣辱的大事[②]。

第三，翻译的西方科学小说直接推动了中国本土科幻创作，促成了科幻这一文类在中国诞生，“中国想象”开始萌芽。早期的中国本土科幻往往模仿译介自西方的科学小说。比如，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1904）中能看到凡尔纳《奇异旅行》（*Voyages Extraordinaires*）系列的影子，包天笑的《世界末日记》（1908）与梁启超1902年的翻译小说直接同名，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1905）也是在包天笑翻译的《法螺先生谭》基础上创作的续集。此后，《未来世界》（1907）、《新纪元》（1908）、《光绪万年》（1908）、《新中国》（1910）等未来小说系列无不受到翻译小说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晚清的科学小说大多转译自日译本，然而科幻这一文类却未能在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生根发芽。即便是最受欢迎的凡尔纳作品，也在森田思轩1897年《十五少年》的日译本出版之后告一段落了。然而，这些作品却得到在日本流亡或留学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被引译至中国，其主要动因在于这一文类契合晚清时期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需求。不难看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欲借科学小说这一文类“展望”和“憧憬”中国的未来，建构属于中华民族的未来想象。

可见，文学想象可转化为一种变革的力量，中国科幻与“中国想象”自孕育之初便被赋予了特殊的民族使命，展现出中华民族的韧性和独特的民族乐观主义情怀。尽管近代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之中，然而在西学影响之下所展望的“未来”却是“极度乐观、有光、有热、有主观能动性……往往与变革或革命连在一起，成为变革中一支有力的武器，任何人只要掌握‘未来’，就可以有

①马建忠：《拟设翻译书院议》，徐中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1840—1919》（文学理论集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682页。

②梁启超：《论学校七·变法通议三之七·译书》，《时务报》，1897年4月21日第27期。

极大的力量”[①]。诚然,近代科幻在中国肩负的科学启蒙、民族解放的民族主义使命固然推动了晚清科学小说翻译的小浪潮,但也造就了科幻这一文类的特殊性,即“工具性”超越“文学性”,“实用价值”远超“美学价值”。这也解释了为何五四之后无论是科幻的翻译还是原创均遭遇低潮。

20世纪20年代起,科幻文学的译介走向低潮。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②]的统计,1919至1949年我国共翻译出版了20本域外科幻小说[③],较之清末民初译本数量[④]下降明显。在原创方面,这一时期可圈可点的作品只有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⑤]和老舍发表于1932年的《猫城记》,而后者是这一时期中国科幻创作的亮点,也是“中国想象”走出去的起点。

二、开启对话:中国科幻西方传播的萌芽(1950—1966)与兴起(1976—1999)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十七年时期,中国科幻在西方的传播实现个案突破。老舍的《猫城记》成为首部译介至西方世界的中国长篇科幻作品。1964年,第一个英译本*City of Cats*由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译者为詹姆斯·杜(James Dew),这是西方汉学家翻译中国科幻的首次尝试。尽管这一版本并非全译本,出版后的影响力也较为有限,但有首译之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译本是密大中国学研究专题系列丛书之一,丛书中另外两部是关于元杂剧和中国经济的研究专著,因而,作为该系列的唯一译著,这一译本的定位和风格也更偏重中国学研究方向。詹姆斯在译序中强调了作品的社会和政治讽喻性,他写道:“几乎在《猫城记》每一页的角色刻画和情节描绘中,均能找到与本世纪前三十年中国历史现实的呼应之处。要彻底地比较和阐述这些相似之处,需要写出一篇几乎与译文长度相当的文章。”[⑥]该译本被缩减到原著长度的三分之二,译者自述删减了原作中的一些次要情节,因为其“对实现讽喻目的作用不大”[⑦]。与此同时,译者在译文中增加了大量译注,这些翻译副文本主要用于阐释《猫城记》中所描绘的事件与中国近代史实的相似之处,并佐以权威史料文献,对中国语言文字系统、鸦片的影响、妇女的地位、封建家长制度等大量中国文化、历史背景知识加以详细阐释,译本最后甚至附上了长长的“参考文献”。可见,该译本的定位是学术研究,虽在读者中流传不广,但却成为重要的中国学研究资料。

在1964年英译本的激励之下,《猫城记》在西方世界迅速获得关注,成为中国想象走向世界的先行者。1970年,俄亥俄大学出版社出版由威廉·莱尔(William Lyell)翻译的重译本*Cat Country*,系《猫城记》的精装全译本,也是至今仍在出版发行的主流英译本。该译本数次再版,后被收录在企鹅现代经典书系(Penguin Modern Classics)中,由美籍加拿大裔作家、评论家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重新撰写了导读。2013年,“企鹅电子书系”(Penguin eBooks)出版了该译本的Kindle版,2015

①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中的“未来”》,《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9期。

②参见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③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的统计,具体数目为:1919[1];1921[2],1931[1];1934[1],1937[2],1938[2],1940[2],1942[1],1944[2],1946[2],1947[1],1948[1],1949[2]。

④根据《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目录1840—1919》统计,这一时期冠以“科学小说”之名出版、发行的翻译作品有60部之多(包括部分发表于“理想小说”“哲理小说”等栏目之下的科幻小说),对于一个新兴的文学类型而言数量十分可观。参见陆国飞编著:《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目录1840—1919》,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25页。

⑤注:1922年,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沈从文此作是对其的续写。

⑥James E. Dew, *City of Cats*, Ann Arbor,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4, p. viii.

⑦James E. Dew, *City of Cats*, Ann Arbor,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4, p. viii.

年，该译本被收录至“企鹅中国文学经典系列”，再次推出其纸质平装本。伊恩称赞《猫城记》为老舍的“创作巅峰”，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引人注目且具有预言性的小说之一。较之侧重于解读作品叙事与近代中国历史现实之间关联性的1964年译本，这一全译本旨在最大程度地向英语世界读者展现作品的全貌。该译本以晨光出版公司1949年的版本为翻译底本，译者撰写了长篇译序，详细介绍了老舍的个人经历，强调其曾在英国任教、受到西方文学影响，分析了《猫城记》的创作背景、写作风格，认为其受到了查尔斯·狄更斯作品的影响，尤其是《尼古拉斯·尼克贝》（*Nicholas Nickleby*）和《匹克威克外传》（*The Pickwick Papers*）这两部小说。译者认为《猫城记》是老舍的一部重要作品（尽管老舍自认是失败之作），反映出作者对1930年代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展现出其独特的写作风格，能够为英语世界读者提供深入了解那个时代中国的窗口。这一译本的出现，代表着《猫城记》的文学性开始与其现实讽喻性同样得到西方读者和学者的认可，也为中国科幻文学的进一步传播打开了大门。

《猫城记》在走向英语世界的同时，也陆续被翻译成法、德、日、俄、匈牙利语、土耳其语。1969年，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谢马诺夫（Vladimir Ivanovič Semanov）翻译的俄文版率先由苏联科学出版社（Hayka）出版，该书于1977年再版。1980年，由稻叶昭二翻译的日文版出版，属于当时Sanrio公司推出的“科学幻想文库”丛书之一。1981年苏联进步出版社（Прогресс）出版的《老舍选集》中也收入了《猫城记》以及《我怎样写〈猫城记〉》。同年，匈牙利文的译本 *Macskaváros krónikája* 由布达佩斯的欧洲出版社（Európa）出版，法文译本 *La cité des chats* 由法国东方出版社（POF）出版。1985年，德文译本也由德国著名的苏尔坎普出版（Suhrkamp Verlag）出版[①]。由此可见，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主流欧美国家已开始关注中国科幻。

在关注中国科幻走向世界征程的同时，亦有必要简要回顾这一时期外国科幻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十七年时期，对苏联科幻文学的翻译曾一枝独秀，不少具有“科普化”倾向的苏联科幻来到中国。短暂沉寂之后，科幻文学的翻译与创作活动开始复苏，尤其在改革开放初期，对科学知识的追求促进了新一波的科幻翻译小高潮。这一时期，译本选择更倾向于西方，80年代初期科幻文学刊物大量创办，成为翻译及原创科幻小说的重要发表阵地。其间虽在1983年之后经历一段低潮期，但90年代起再次兴盛，翻译至中国的科幻作品数量极速上升，西方科幻小说三巨头艾萨克·阿西莫夫、罗伯特·海因莱因、亚瑟·克拉克均被译介至中国。将上述翻译活动置于一个宏观的中西交流视角之下，不难观察到一个日益明晰的趋势——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西科幻文学的双向性互动开始逐渐形成。

中国本土科幻文学的系统性对外译介活动始于80年代。吴定柏和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Murphy）共同编译的 *Science Fiction from China*（1989）在纽约普雷格（Praeger）出版社出版，本书翻译了8篇80年代初重要的中短篇科幻小说，包括童恩正的《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之死》《珊瑚岛上的死光》、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叶永烈的《自食其果》《腐蚀》、郑文光的《地球的镜像》、王晓达的《神秘的波》和姜云生的《无边的眷恋》，是系统性对外译介中国科幻作品的尝试[②]。美国著名科幻作家和编辑弗雷德里克·波尔（Frederik Pohl）在为本书作序时表示，美国人往往认为科幻小说是美国的独特发明，“终于到了向美国读者展示中国科幻作品的时刻了。我对此表示欢迎。”[③]本书是中国

①2014年，在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俄罗斯联邦出版与大众传媒署支持之下，双方出台了一项中俄文学作品翻译出版计划，一部以《猫城记》为封面主打的选集由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还收录了《茶馆》《二马》以及老舍的多篇散文。2021年，土耳其语译本问世。

②此书的意大利文版 *L' onda misteriosa* 于2006年由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出版社出版。

③Frederik Pohl, "Foreword: Science Fiction and China," in *Science Fiction from China*, Edited by Dingbo Wu and Patrick D. Murphy, vii–ix New York: Praeger, 1989, p. vii.

当代科幻作家在西方的第一次群体亮相,打开了“中国想象”进入英语世界文化空间的大门。

与此同时,英语国家以外的西方世界也开始关注中国科幻创作。比如1984年德国出版的中国短篇科幻小说集*Science Fiction aus China*收录了叶永烈的《腐蚀》,他的《碧岛谍影》《如梦初醒》也被译成法文(1986)、意大利文(1989)等语种出版。1986年,伊丽莎白·安·赫尔(Elizabeth Anne Hull)和弗雷德里克·波尔主编的科幻文集*Tales from the Planet Earth*[①]出版,其中收录了叶永烈1985年发表在《科学天地》的短篇《其实只有一个》(英译为The Thursday Events)。90年代,美国科幻史学家詹姆斯·冈恩(James E. Gunn)在其主编的《科幻之路六:世界科幻小说选》(*The Road to Science Fiction 6: Around the World*, 1998)之中,收录了1989年版叶永烈的《腐蚀》和《地球的镜像》英译本,后者作为中国科幻经典代表作,与来自法、德、俄、意以及拉美、印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科幻小说共同进入全球科幻读者的视野。

回观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末的这段历史,不难发现中国科幻文学对外译介活动在这一阶段实现了从“个案式突破”到“系统性开端”的跨越。这一发展轨迹具有重要意义,其特点体现在:

第一,汉学开路。《猫城记》作为中国想象走出去的标志性起点,其译介和传播离不开西方汉学研究的推动,其早期译本均由精研中文、对中国研究怀有浓厚兴趣的汉学家完成。事实上,在被翻译成英文之前,《猫城记》已得到西方汉学家的关注。在1961年发表在*China Quarterly*上的一篇论文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西里尔·伯奇(Cyril Birch)教授曾撰文分析老舍的文学创作,其中便分析了《猫城记》并摘译部分片段,指出老舍通过刻画猫人讽喻中国“国民性”中的各种弱点,这样的批判性在从吴敬梓到鲁迅的中国作家之中一脉相承。此后,首个英译本译者在译序中专门加上一则“附言”(Post Scriptum),称赞伯奇的阐释切中肯綮[②]。中国近代史专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在1990年出版的史学著作《追寻现代中国》中,也以两页篇幅介绍《猫城记》这部小说,以此论述1930年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危机与民族心态。

第二,学界先行。除却西方汉学家的译介、研究之外,吴定柏、叶永烈等中国学界的代表是这一时期推动“中国想象”走出去的关键性人物。在对外译介小说的同时,中国学者也开始在国际上发表推介中国科幻的文章,向世界展现中国科幻创作的发展进程。自80年代起,吴定柏和叶永烈均在科幻行业杂志《轨迹》(*Locus*)上发表过多篇介绍中国科幻发展的文章[③],成为世界一窥中国科幻创作的窗口。发展至90年代,中国学界与冈恩等西方科幻学者不断交流,成功使得西方科幻界逐步了解中国的科幻创作,推动“中国想象”进入西方主流科幻世界。

由此可见,在中国想象“走出去”的萌芽与兴起阶段,中国科幻的海外影响力主要还是停留在较为精英的知识界层面,尚未走入普通大众读者的视野。这一轨迹与彼时西方渴望了解“崛起中的中国”的现实需要和迫切愿望同步。对西方而言,中国科幻的现实性、实用性价值大于其文学性、审美性价值,成为一窥东方中国的文化路径。然而,对于一个在晚清时期才通过译介西方进入中国的新兴文类而言,在不过百年之间,中国科幻已经从初始期模仿西方、发展至具备实力向西方传播,这反映出中西交流模式的演进和发展,在客观上中西双向对话的格局初步奠定。

---

①该文集中收录了19篇中短篇科幻小说,以原创为主,其中6篇为翻译作品。See:Hull, Elizabeth Anne and Frederik Pohl, eds. *Tales from the Planet Earth*. St Martin' s Press, 1986.

②James E. Dew, *City of Cats*, Ann Arbor,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4, p. viii.

③主要有:叶永烈的"SF in China"(1981),"Another View (Orientation)"(1982),"SF Magazines in China"(1983),"1932:Foreign SF in Chinese "和"A Shanghai Meeting"(1983);吴定柏的 "SF Report from China" (1983)," Chinese SF in Trouble"(1984),"Report from China: SF Contest in China"(1985), " News from China"(1986)Chinese Sf (1988)"Everlasting Memory"(1988)和Chinese SF Outside of the Mainland(1992)。

三、全球圈粉：媒介融合与中国科幻西方传播的蓬勃发展（2000—至今）

进入21世纪，数字全球化（Digital Globalization）时代到来，媒介融合成为时代的重要特征。至此，中国想象“走出去”的历程进入蓬勃发展期，跨媒介传播成为重要路径。在传统媒介时期，每一种媒介的受众与影响范围泾渭分明，在各自领域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进入数字化时代之后，媒介分而治之的状态被打破，“融合文化”（Convergence）成为时代主流，其三大组成要素分别为“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参与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与“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在数字全球化语境之下，媒介融合与参与式文化的兴起，无疑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文化范式，对中国科幻海外传播的路径、方法和范式产生深远影响。简言之，中国科幻在西方的传播路径发生范式性转变，即：从“抵达精英”转为“征服大众”。

（一）传统科幻文学的跨媒介传播

数字全球化的特征不仅促使读者的阅读偏好经历数字化转型，也推动着翻译和传播活动经历了“技术转向”和“社交转向”。“中国想象”走出去进入蓬勃发展期，这不仅体现在对外翻译的中国科幻文学数量激增，在海外读者中的影响力日盛；还体现在翻译文本以不同媒介形式（比如：纸质书、电子书、有声书、漫画、动漫、电影、剧集、微短剧、游戏、粉丝同人）、在多样化的媒介平台之间交叉传播，吸引了不同层次的受众，且各媒介平台相互促进、参与式文化兴起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科幻在海外的接受效果。这一时期中国科幻对外传播的主要成就和特点包括：

第一，刘慈欣作品大规模对外译介和跨媒介传播

刘慈欣作品的海外传播已经成为现象级文化事件，截至2024年，已有6部长篇小说、3部作品集、1部中篇小说以及25部短篇小说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在全球出版发行[①]。其传播形式涵盖了图书、有声书、电影、漫画、动漫、粉丝改编动画以及纪录片等，成功走进了海外大众心灵深处，实现了中国想象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跨越。以刘慈欣代表作《三体》系列为例，在海外最具影响力的娱乐、新闻和社交综合站点红迪网（Reddit），关于刘慈欣科幻的新闻、评论、讨论数量惊人，仅三体讨论小组就拥有7.4万粉丝，位列全站排名的前2%。近年来，根据三体IP改编出现了三部影响力较大的影视化作品[②]，分别为2024年正式播出Netflix原创剧集《三体》，2023年由央视与腾讯视频联合出品的电视剧《三体》，以及从2014年起开始制作、连载的粉丝自制的动画番剧《我的三体》（发布于bilibili平台）。在全球最大的电影数据网站IMDb上[③]，腾讯版《三体》的评分为7.6/10（评分人数7.4万），1.4万人加入看单；Netflix版评分为7.5/10（评分人数15.8万），21万人加入看单；较为小众的*My Three Body*亦有301位用户打分，评分为8.3。作为以中国科幻IP改编的影视作品系列，《三体》的评价、宣传、评分等各项数据的强劲表现及其公众关注度，完全可以与美国影视工业中最强的科幻类型分庭抗礼，这表明“中国想象”走出去之路实现了质的飞跃。

《三体》系列的海外传播将数字化时代的跨媒介性、社交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以腾讯版为例，通过不同发行渠道收获不同文化、地域乃至年龄分段的目标受众，而多平台协力则使得《三体》IP的传播效果发挥到极致。比如，在Youtube平台上，腾讯视频的官方账号2023年在国内首播之时便同步面向部分海外地区用户更新英文字幕版，可免费观影的前两集浏览量约127万人次；同时，咪咕

①近年来出现了一些绝对小众的语言译本，比如2024年2月Duna Llibres出版的加泰罗尼亚语《三体》（2016年西班牙语版已经由Nova出版）。

②另有一部未上映（2016年宣布暂缓上映）的*The Three-Body Problem：I*，由张番番执导、游族影业与阿里影业出品的电影《三体》（*The Three-Body Problem：I*），在IMDb上也有5000多人将之加入愿望单。

③数据更新至2025年2月，下同。

视频官方号上传的中文版《三体》全集总浏览量也达到60万次;而Netflix版在Youtube的官方预告片总浏览量已经达1439万次,可见其关注度之高。值得注意的是,腾讯版《三体》海外传播已经做到针对不同的目标受众实现精准化投放,提高传播效率。比如,在中文版播出后一个月,俄文配音版《三体》登陆了俄罗斯当地流媒体平台OKKO,目前获得8.0的评分。英文字幕版更是全面覆盖西方主流平台:2023年9月,在美国公共电视网(PBS)电视频道KCTS 9播出,覆盖北美全境;2024年2月,在美国NBC环球流媒体平台Peacock上线,赶在网飞版上线之前又收获一波热潮,且Amazon Prime Video也购买了腾讯英文版《三体》的播映权。同时,以强大的"字幕组翻译+社交化观影"体验见长的乐天Viki也购买了《三体》播映权,并主打数字化内容运营的差异化竞争,该剧的翻译由字幕组"Turkeys in a Dark Forest"提供,提供由志愿者翻译的英、法、德、匈、希、意等11种字幕,Viki平台上观影的评分高达9.3。由此可见,《三体》在西方的传播覆盖了主流的电视网络、流媒体平台和社交平台,且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提供多样化、多语种、跨平台的差异化内容服务,力图最大程度地拓宽中国科幻的目标受众,提高对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第二,中国科幻作家的群体影响力日增

2010年,意大利*Urania*科幻杂志出版洛伦佐·安多尔法托(Lorenzo Andolfatto)主编的中国科幻文集*Shi Kong: China Futures*,收录了郑文光、叶永烈、韩松、王晋康、刘慈欣、柳文扬、金涛、何夕等人作品的意大利文译本;2016年刘宇昆翻译出版了中国科幻文集*Invisible Planets*,收录了刘慈欣、陈楸帆、夏笳、马伯庸、郝景芳等的代表作;2017年,意大利出版中国科幻短篇集*Nebula: Fantascienza contemporanea cinese*,收录刘慈欣、夏笳、陈楸帆、吴岩等人作品;2018年,郝景芳法文作品集*L'insondable profondeur de la solitude*出版,宋明炜与西奥多·胡特尔斯(Theodore Huters)合作编译出版中国科幻文集*The Reincarnated Giant*,汇集21世纪中国科幻文学的15部重要作品;2019年,法国文学杂志*Jentayu*第10期出版中国科幻小说专号,刊载陈秋帆、韩松、夏笳、潘海天、糖匪等人作品;2022年,中国科幻小说集*New Voices in Chinese Science Fiction*出版,收录了双翅目、刘啸、杨晚晴、灰狐、慕明、梁清散等当代科幻作家作品的英译本。同时,即使是传统的科幻作家和学者群体,也日益注重在社交媒体上的宣传,将社交化作为推动其作品传播的重要动力。

第三,中国科幻文学海外译介与传播路径日益多样化

一方面,以中国官方机构为代表的翻译赞助人在对外译介过程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中国科幻海外传播成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文化战略。即使是在国际市场取得巨大成功的《三体》系列,在起步阶段也离不开中国官方机构的支持,其外译活动分别获得过"丝路书香工程"和"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的资助。从最早翻译刘慈欣的短篇小说《思想者》("The Thinker")的文学双语刊物《天南》,到在没有任何海外出版意向之时便投入资金邀请译者进行《三体》系列翻译工作的中教图(版权输出机构),国际现象级文化事件《三体》的横空出世离不开国内出版机构的推动,官方机构不仅投入了经济资本,还投入了社会资本,正是在官方的推动之下,刘慈欣作品才逐渐进入海外主流出版与发行渠道,进入海外大众的视野。[①]启动于2017年的"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共15本)则是在中国机构推动下、通过国际化合作传播中国科幻文化的典型案例。该项目由北京漫传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牵头组织,国内出版机构为中信集团,创作团队包含中、法、意、美20多位优秀漫画家。目前,漫画系列的英文版2021年由Head of Zeus同步出版,法文版由法国知名漫画出版机构代勒古集团(Delcourt)于2023年出版。法文系列取名"刘慈欣未来系列"(*Les Futurs de Liu Cixin*),强调其推想未来的功能,法文版推介称这15个科幻故事交汇在科学、地缘政治和人文主义的维度之间,深刻想象、思考了人类文明的未来。可见,虽定为中国原创科幻漫画项目,但该项目生动演绎了如

①吴攸,陈滔秋:《数字全球化时代刘慈欣科幻文学的译介与传播》,《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何借助国际合作力量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并在人类普遍性的维度上引起国际读者的共鸣。

另一方面，数智时代，网络在线平台的粉丝志愿翻译、同人改编、短视频制作等“娱乐劳动”已为中国科幻的海外传播开拓出全新路径，粉丝的社交活动正加速推动中国科幻直接走向海外大众。比如，Viki平台是典型的粉丝社交性跨国流媒体平台，其最大的特点是该平台的用户往往集“观众”“译者”“传播者”等多重身份为一体，每个频道由不同的志愿者团队服务，由用户志愿加入，其中包括剪辑、字幕、翻译、校对以及频道管理人员，采用类似维基百科式众包翻译的方式提供字幕翻译（提供200多种语言服务），当达到合格贡献者（QC，Qualified Contributor）或黄金贡献者（Gold QC）级别将解锁对应的平台权益和身份。正因如此，Viki平台上的《三体》拥有包括希腊语、罗马尼亚语在内小众非通用语字幕，同时还能与全球用户在线观看、评论及互动。如此，基于社交互动的差异化内容供给方式为《三体》带来了更多新的观众，也诠释了数字化时代的粉丝娱乐劳动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换言之，中国科幻海外传播的目标受众（即海外读者/观众）出于强烈喜爱，自发加入翻译、校对以及粉丝二创等活动之中，成为事实上的中国科幻文化传播者。同时，新媒介平台不仅为中国当代科幻的传播创造了时代机遇，还在推动此前创作的科幻作品再媒介化，使其获得数字化新生。比如，最早译介到西方的长篇科幻《猫城记》也正是在2013年Kindle版上线之后才收获了大量的读者（在Goodreads网站全部158条长篇评论中仅有2条发布于2013年之前），后又被海外粉丝制作成音频和视频（如：Youtube上题为Lao She and Cat Country的视频）在新媒介系统中传播。

（二）网络科幻文学的海外传播热潮

“网文出海”成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现象级事件，尽管在海外首先出圈的网文题材是玄幻和仙侠，然而近年来科幻日益成为重要题材之一。根据中国作协于2024年4月发布的《2023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2023年度网文发展的重要特征体现在文类不断融合创新，现实、科幻、历史等题材的作品增速较快，其中新增科幻题材作品约25万部，同比增长15%，当下网文科幻作品数量约200万部[①]。无疑，网文科幻已经成为“中国想象”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而由于网络文学天然具备跨媒介属性，其海外传播是由粉丝读者自愿发起和推动，体现出强烈的“自发性”“互动性”和“社交性”，完美展现了数字全球化时代的“参与性”和“跨媒介性”特征[②]。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后，中国网文科幻对外传播亦得到AI赋能，极大地提升了对外传播效率，其“出海”热潮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网文科幻海外译介策略多样化，体现出强烈的社交性特质。以起点国际站Webnovel平台为例，科幻是重要文类，许多阅文旗下作品在海外同步发布。其翻译模式多样，既有基于粉丝（团队）人工翻译模式，也有使用“机器翻译+用户在线编辑”的机器翻译模式，二者均体现出读者的参与性。许多科幻网文在海外备受追捧，比如我吃西红柿（网文出海的第一部现象级作品《盘龙》的作者）的《吞噬星空》、黑山老鬼的《从红月开始》、远瞳的《异常生物见闻录》《希灵帝国》等。科幻网文的海外传播呈现出社交性、互动性和跨媒介的特征，海外读者不仅成为中国网文的潜在翻译者，还成为自发传播者（比如粉丝读者创作出漫画、视频、粉丝同人文等大量衍生品），由海外粉丝（即受众）推动中国科幻进一步传播成为重要特点。

第二，科幻网文海外传播效能持续提升。一方面，网络文学天然的“超文本性”使其呈现出开放、自主和互动的特征，其对外传播形式也打破了传统的地域疆界局限，直接向全球受众开放，本身便体现出即时性特征。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技术的兴起进一步提升出海效率。《2023

①《2023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4/0527/c404023-40244118.html，2024.11.06.

②Wu You，"Digital Globalization，Fan Culture and Transmedia Storytelling：The Rise of Web Fiction as a Burgeoning Literary Genre in China."*Critical Arts*，Vol. 37，No. 4，2023，p. 33.

中国网络文学出海趋势报告》显示,AIGC技术的应用持续升级人机配合的AI翻译模式,使得网文翻译效率提升近百倍,成本却降低超九成[①]。这打破了机器翻译适用于"低质量翻译"的传统认知,如包括中译英的《神话纪元,我进化成了恒星级巨兽》在内的多部AI翻译作品已成Webnovel的畅销作品。这表明AI技术的应用正在推动中国网文"一键出海",技术赋能使得网文科幻全球"同步更新"和"全球圈粉"成为可能。

第三,网文科幻的对外译介不仅传播了中国文化,还对外输出了一种文学创作和文化经营模式[②]。出于对中国网文的热爱,越来越多的海外读者开始模仿中国网文的模式进行创作。早在网文出海早期,在粉丝志愿翻译网站就有海外粉丝读者模仿中国网文模式进行创作,比如,早期十分知名的丹麦作者Tinalynge,她创作的*Blue Phoenix*和*Overthrowing Fate*等作品最初是在粉丝翻译网站"武侠世界"连载,后以Kindle和有声书的形式登陆亚马逊成为畅销书。如今,中国网文模式已形成体系化的影响力。以"起点国际"为例,截至2023年底平台已上线约3600部中国网文的翻译作品,同时亦推出海外原创作品约61万部,培养海外作家约40万名,分布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③]这表明中国网文的叙事手法、运营模式被韩国网文、欧美网文、微短剧广泛借鉴,"中国模式+西方元素"的国际融合路径正在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形态。

由此可见,新世纪以来的媒介融合趋势正在模糊着不同媒介之间的边界,这样分散的、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模式不仅促进了受众的自由,更提高了传播效能。一方面,中国科幻文学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呈现出多维度、体系化与规模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在数字化时代,中国科幻在西方的传播呈现出鲜明的"跨媒介"特征:传统媒介与新型媒介交汇融合,草根媒体和机构媒体相互渗透,媒介生产者与消费者(受众)不断互动,多维度协同合作推动着中国科幻文学逐渐走进西方文化的深层空间之中。与晚清的"译入"浪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下,我们正迎来以"中国想象走出去"为标志的第二次科幻文学翻译浪潮。

四、结语:定义面向未来的世界想象

纵观百年来中国科幻对外传播历程不难发现,在中西交流发展史的视野之下,"中国想象"走出去的历程具有多重面向和特点:第一,中国科幻文学孕育于晚清的"西学东渐"翻译大潮,经历本土化发展之后又通过译介进入西方,成为"中学西传"的重要纽带,这一历程反映出中西交流模式的演进;第二,中国科幻的海外传播与媒介革命息息相关,从晚清时期报业的发展为中国科幻诞生提供平台,到如今数字化语境下的"跨媒介"传播路径促进其进入西方主流和大众文化空间,(新)媒体技术是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重要推动力;第三,数字全球化时代,媒介融合趋势带来参与式文化蓬勃兴起,中国科幻的海外受众(粉丝读者)成为自发的传播者,中国科幻的海外传播呈现"社交转向"的特征。因而,如何充分运用新媒体社交维度功能,进一步推动海外受众自发参与中国科幻的传播,成为当下这一"数智"时代推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关键。

尽管本文尝试将中国科幻的海外传播按照历时性阶段进行了划分,然而透过这一"中学西传"的历程,实则反映出一系列打破二元对立而走向融合、共同的过程,具有多重启示意义:第一,超越"西方影响—中国接受"的二元对立。"中国想象"海外传播的发展历程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模式由

①《2023中国网络文学出海趋势报告》,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3/1208/c404023-40134471.html,2024.10.06.

②Wu You, Globalization,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China Story: Translation,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Liu Cixin's Works across the Globe. *Critical Arts*, Vol. 34, No. 6, 2020, p. 68.

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52页。

近代“西学东渐”的输入模式转向当代“多元共生”的对话模式，这充分表明，“借鉴西学方法，能够成功激活中国经验，并使之反哺于西方，成为世界知识生产与理论创新的动力”①。第二，跳出“传播—接受”二分的思维定式。数字化时代的文学作品已成为文字、影像以及声音三大符号媒介的有效融合，文学的“创作—翻译”和读者的“评论—接受”之间相互影响，原本单向的“翻译—传播—接受”路径已经转型为多声部、进行态、去中心化的“社交共读”，其传播和接受方式也成为“全球参与”“集体智慧”的结果。通过作者—译者—读者的不断互动，借助粉丝自发性“娱乐劳动”对作品接受场景的开拓，中国科幻的目标受众已经逐步成为作品再媒介化的生产者和中国科幻文化自发的传播者，这也成为“中国想象”能真正进入西方文化深层空间的关键。第三，从“中国性”走向“世界性”，打破“中—西”二元对立，为解决人类面对的共同议题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如欲在世界性维度上彰显其重要意义，一方面自然要凸显中国立场，另一方面更须具备世界性格局，二者有机融合，方可成功建构得到世界普遍认同的知识模式和理论话语②。科幻本身便是最具有世界性思维的方式，其面对的问题和危机也往往是人类所共同面对的③。“中国想象”从孕育到发展的过程中既借鉴了西方科幻的创作模式、叙事技巧，又融合了鲜明的中国元素和中国智慧，正是这一独特的气质使其能够在跨越文化旅行中引起国际受众的共鸣④。无论是刘慈欣漫画团队的国际化合作，还是《三体》IP经Netflix改编的再传播，均充分表明“民族性—世界性”之间并无泾渭分明的区隔，“中国想象”能够“全球圈粉”正是在于其兼具“中国气度”与“世界格局”。

当然，对世界性的观照并不意味着对中国性的忽视或否定，相反，推动“中国想象”走出去无疑体现出国家意志，其宗旨便是在全球范围内更有效地传播中国价值观念。2020年8月，“科幻十条”发布，代表了从国家层面争夺对未来想象定义权的战略布局。纵观“中国想象”走出去的历程，经历了从精英走向大众，从“内容”传播到“模式”输出的跨越。近年来，中国科幻IP成功引领文化流行趋势、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科幻在西方的传播也成功实现了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再到西方民众主动“请进来”的跨越。这体现出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播中国价值理念的理想路径，也正是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强调的国家软实力的精髓所在，即文化、价值观及外交政策所展现出的“吸引力”（Attractive Power）。在这一点上，中国科幻的海外粉丝积极参与并自发推动“中国想象”的国际传播，粉丝的“娱乐劳动”推动了中国科幻“全球圈粉”，中国科幻IP影响下的海外原创生态正在形成，均在不同维度赋予了“中国想象”多重延伸空间与世界性活力。无疑，在全球化的今天，“想象力”已成为最具前瞻性的文化软实力因素，对未来世界想象的定义权将成为大国力量博弈的新焦点。在这一语境之下，“中国想象”海外传播的态势、发展与潜力值得持续关注。

［责任编辑：李　炜］

①吴攸：《“中国想象”在西方科幻世界的传播》，《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2月19日第A5版。

②吴攸：《中西互鉴与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从弗朗索瓦·于连对中国智慧的跨文化思考谈开去》，《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③刘慈欣，吴言：《星空的奥妙：刘慈欣访谈》，《名作欣赏》，2016年第1期。

④吴攸，陈滔秋：《数字全球化时代刘慈欣科幻文学的译介与传播》，《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